

粪桶

我最后一次挑粪桶,是1985年夏日的一天傍晚,具体哪一天,我记不得了。但那个场景,我永志不忘。

那天傍晚,烈日的余威犹存,我挑着两桶粪,和祖母一起去村西南方向的南大漕北侧我家自留地上浇粪。浇完粪,又挑了两桶河水——其实也是用河水将粪桶清洗,浇菜地。边上都是满地漫漶的南瓜藤、山芋藤。故乡夏天都是在傍晚浇菜地,若早上浇水浇粪,白天暑热蒸腾之后,一早的辛劳就成了白忙乎。

浇完粪正在浇水的我,听到几百米外村口,我堂婶和堂姑扯着嗓子喊我和祖母赶紧回家,说我考上大学了。我一听,扔下手里的撩勺,也不管粪桶了,撒腿就往村里跑。祖母迈着急解的小脚,在我后面紧追慢赶。

到家后,我的两个同学告诉我,录取通知书到学校了,我被人民大学录取了。随后赶回家的祖母忙着张罗,堂姑端来了一堆鸡蛋,并帮祖母烧火,祖母做了好多个水溲蛋,给我们两位来报喜的同学和我做点心。当年,水溲蛋是故乡乡下招待贵客娇客的佳品。

我后来写文章,一直将我得知考上大学的场景与范进知道自己中举的场景作比。那时的我,梦想的是吃皇粮,成为新时代的新范进。范进得知自己中举时,家里已经揭不开锅,正在街上插草卖鸡,图换点米回家做饭。而我,则是光着脚挑粪浇水,看上去比范进好多了。

中举时我的道具是粪桶,以及粪桶伴侣撩勺——用来浇粪浇水的长柄勺子。当时我扔下的粪桶撩勺,并不会丢,稍晚一点,家里人就把它们挑了回来。就算是粪桶撩勺,即使我考上大学了,再也不会去挑粪桶了,家里也不会丢。我家被拆之前,家里有两个抽水马桶,一个茅坑,好几只粪桶。茅坑边上放着一只粪桶,专门用来装尿,满了就去菜地浇了。一如直到今天,我家房子被拆迁了,田地被征用了,我父母兄弟暂时借居栖身之地,即使又新安装了两个抽水马桶,仍有粪桶。因为借居的亲戚家有菜地,粪桶仍有用。不过,这个时候的粪桶,已经是塑料粪桶了,我那个时候,还都是木制粪桶。在乡下,有菜地,粪桶就有用处之地。

粪桶是江南农家非常重要的一种生活生产用具。圆桶形,每只桶有两块板要稍长,凸出的部分中间挖空,像耳朵一样,用来装竹夹。竹夹是挑粪时挂在扁担上的,通常用竹竹做成。做好的桶,最好要打上桐油,晒干后防腐防漏。在传统工艺时代,粪桶和水桶一样,看似简单,其实制作起来要复杂得多,一般木匠并不会做。做粪桶、水桶的,叫箍桶匠,他们通常善于制作带有弧度的木桶。二十世纪大哲学家海德格尔就是一个德国箍桶匠的儿子。汪曾祺在《受戒》里说,他老家下河地区盛产箍桶匠,而当年整个前黄往北,只有水车桥有一个箍桶匠,也是苏北人,是我父亲的寄爹。父亲打鱼的脚盆是

他寄爹打的,想来我家的水桶、粪桶,也应该是寄公公打的。

“新箍马桶三日香”,新箍的粪桶没用之前当然也不臭,反而多木质感,和桐油味。但一旦使用,便永无回头之日,洗得再干净,也摆脱不了“脏臭”的名声,一如它的名字,“粪桶”。

粪桶起源于何时,“度娘”说是宋朝,我没有研究过,只有切身的生活经验。粪桶,顾名思义,是用来装粪挑粪的。但粪桶具体派何用途,却并不只是装粪挑粪。在江南传统农家,大便有茅坑,粪桶除了挑粪用外,平常则承担着接纳人们尤其其男性家庭成员小便的功能。因为自留地上种的菜,除了浇水,浇最多的是尿,用粪也得稀释后。典型如农家种韭菜,割完一茬必得撒草木灰浇尿,长出的韭菜才好。这是粪桶的一大优势。当然,浇水也用粪桶。过去粪桶还有一个用处,就是挑河泥积肥也有用粪桶的,不过,河泥可比粪水重多了。旧时种冬芹,拔芹菜时,芹菜地太冷,即使穿了胶鞋也挡不住阴冷,也有人踩在洗干净了的粪桶里下地拔冬芹,但移动起来颇为不便。在故乡,夏天或秋冬时想弄干小河沟,没有打水的现代设备,通常就是将粪桶耳朵上的竹夹子脱下,用担绳穿过,两边各一人,牵扯着担绳,用粪桶打水干河沟。

旧时江南挑粪浇菜的,男女都干,谁有空谁干。很少有逃过挑粪桶的一双肩膀。我有时候跟家里人开玩笑,说我小时候之所以长得矮小,除了营养不好,就是还没发育健全就扛粪桶、挑粪桶给压的。

我小时候在乡下干活,浇粪不少,从来就是两人扛一只粪桶,或者一人挑两只粪桶,用长柄的木勺子浇粪。捉狗屎、拾牛粪也干过,不过那不会用粪桶装,是用篾做的粪筐簸箕。我不知道竟然有些地方粪桶是背的,比如北京。这是以自己的狭隘生活经验来推导,犯了严重的经验主义错误,也是主观主义错误。我后来在媒体业服务,才知道中国青年报的栏目“冰点”,开篇第一篇,就是《北京最后的粪桶》,写北京的背粪工。不过,江南的粪桶和北京的粪桶不同,无论形制,还是功能。我从来没有在江南农村看到背粪桶的。也许,也跟北方的粪工,南方的粪桶有关吧。

曾经读到过浙江画家吴藕汀写的文章,载于他的《药窗诗话》,题为《粪桶》。在这篇文章中,吴先生提到嘉兴有“粪桶也生耳朵”的俗语,有双重意思,“一是指‘不灵市面的人’,一是指‘大家都知道的事’。”吴先生还在文章中提及嘉兴弹词名家夏荷生未成名时因被嘉兴人嫌土气,他感到委屈,用“粪桶也生耳朵”取笑嘉兴人不懂听书,引发一些人的愤怒,只好逃到苏州,后在苏州成名。

所以,吴先生慨叹:“一担挑来重氮肥,竖生两耳是耶非。未知好歹休评说,此语何堪作诨词。”

我读吴先生此文,倒也觉得“粪桶也生两只耳朵”的喻指,虽然刻薄,但很有意思,也很形象。不过苏北地区没有这种说法,我不清楚。至少,武进前黄礼嘉这片,应该没有此类说法。

辉煌历程 ——顾祖年

今年5月28日是上海《解放日报》创刊75周年。当天,《解放日报》刊出8个整版,详细介绍了创刊历程以及范长江、恽逸群两位报业巨子作出的突出贡献。“解放之路”寻访报道特别小组风尘仆仆从延安到济南,再到常州,又赶赴丹阳,日夜兼程一路采访。到济南和常州采访,是因为《解放日报》创刊与恽逸群这位大名鼎鼎的“中国新闻界巨子”,杰出的新闻文化界战士、著名政论家、社会活动家、新闻教育家有不可分割的关系。

一、起步于济南《新民主报》

1948年夏,济南解放前夕,中共中央华东局指示,由时任大众日报总编辑和新华社华东总分社第一副社长兼华中新闻学校校长恽逸群抽调120余人组成济南市军管会出版部,恽逸群任部长,负责接管济南的新闻文化出版机构。

济南原有新闻出版单位20多家,还有10多家印刷厂、书店等。恽逸群组织人员迅速查封并接管了国民党经营的所有报社、书店、印刷厂,清理财产,整顿人员,随后召集私营书店、印刷业业主座谈会,向他们解释党的文化政策和工商业政策,打消其顾虑,鼓励他们尽快恢复营业,为新民主主义建设服务。数天后,印刷厂和书店纷纷开业,恢复了经营和生产。1948年10月1日,济南解放后第七天,《新民主报》诞生,1.5万份创刊号迅即被市民抢购一空。

《新民主报》创刊后,恽逸群兼任社长总编辑。他首先遇到一个难题,即了解大城市情况、文化水平较高的记者编辑奇缺。恽逸群广揽新闻人才,一方面从华中新闻学校招收学员进行培养,另一方面创造性地运用党的干部政策,从原旧报人员中吸收有进步倾向的人,进行考察教育后录用,发挥其所长。准备南下接收的新闻大队亦从200人扩充到400多人,成为进军上海接收旧报、创办新报的一支强有力队伍。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国统区大城市的报纸出版业长期为国民党把持,广大工商业者和人民群众不了解共产党的政策,需要在新的报纸上进行广泛的宣传引导。恽逸群说,“我们到了江南,要把党的政策带到解放的大城市去,现在就必须把宣传党的各项政策的文献资料准备好。”在他的精心指导下安排下,新民主报社选编好了可供上海连续出版一个月的文献资料,堪称做足了“功课”。

《新民主报》特别重视副刊。恽逸群认为,一张城市报纸能不能得到读者欢迎,副刊起着重要作用。为此,新民主报社还成立了以济南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夏征农为书记

岁月留痕 ——邵洛海

每年夏天,抗洪救灾是个大概率要提到的话题。没有亲身经历过抗洪救灾的人,可能不会想到,部队在抗洪救灾的过程中经常会设置爆破组。我就曾经在一次抗洪救灾中担任过爆破组组长。

那是1983年夏天,我所在的部队驻守在安徽省巢湖与无为县和庐江县交界的青山镇,与青山镇相邻的是安徽最大的劳改农场——白湖农场。白湖农场是上世纪50年代由一个面积162平方公里的自然湖泊改造而来的,改造的方法比较简单直接,就是从湖中间筑两条平行的堤坝,将湖一分为二,湖上中游的水就从两条堤坝形成的大河里通过,再把两个半圆形的湖里的水抽到河里,形成农场的两个区域。农场西区作为监狱,东区作为刑满释放后无家可归或者无意回原籍人员的安置区域。

那年汛情暴发的时候,我所在部队奉命参加抗洪救灾,接受省抗洪指挥部的指令。白湖地区水位连日上涨,省指挥部决定炸开东区堤坝,降低水位,确保西区安全。接到指令后,我们团立即派出人员车辆,跟着农场管理人员赶赴东区,帮助刑满释放人员撤离,搬到部队腾空的营房。同时,命令我担任爆破组组长,执行堤坝爆破任务。

我首先带领爆破组人员勘察堤坝状况,选择爆破作业点,计算爆破药量。任务的难点是在确保爆炸冲击波不会对西侧堤坝造成损

砥砺前行著新篇

——恽逸群与上海《解放日报》创刊



笔者(左三)陪同由上海解放日报上观新闻和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组织的“解放之路”寻访小组一行五人参观采访局小“逸仙中学”恽逸群生平事迹展。

的副刊编委会。报纸副刊除了刊登文艺史实作品外,还兼顾对工青妇等群众的指导。从延安《解放日报》出来,曾参与《新民主报》和上海《解放日报》创刊,后任《解放日报》负责人的张映吾等人回忆,《新民主报》的副刊特色,是当时解放区城市报纸上不多见的。

恽逸群的新闻生涯大部分是在上海度过的,他是个地道的“上海通”,在上海新闻界朋友很多。他担心国民党败退时,会把许多报人和机器物资抢走,给解放后的报业出版带来困难,于是他发挥统战工作特长,通过各种渠道向上海报界,特别是老牌的《申报》《新闻报》等报人打招呼,让他们安心稳定下来,为新中国建设效力。恽逸群在致《申报》工作人员的一封信中写道:“明年春暖花开时,定能把晤沪滨,与兄等畅叙也。”这封信在申报内部引起轰动,人们奔走相告“共产党新闻界的头头来信了”,并纷纷赞扬道:“写得一手好行草……想不到共产党内也有高手啊!”“明年春暖花开”不正是预言上海即将解放吗?把晤沪滨”不正是希望他们留下来继续为新社会服务吗?理解了恽逸群的“潜台词”,上海报界许多人吃了定心丸。果然,翌年5月,上海解放,原《申报》《新闻报》,特别是国民党军方机关报《和平日报》的大部分工作人员和机器物资都被完好地保存了下来,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恽逸群创办《新民主报》,顺利接管国统区新闻出版业所创造的成功经验,得到了重视和总结推广。1948年冬,华东地区党的新闻工作者集中到济南,学习接管济南新闻机构和创办《新民主报》的经验。后来担任上海市委书记的夏征农回忆:“《新民主报》在当时发挥的作用是很大的,它是党中央在解放区对外宣传的一个窗口。”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新闻史学界泰斗方汉奇这样评价:“《新民主报》虽然不存在了,但为后两报(《大众日报》和《解放日报》)提供了城市办报的经验,

并输送了熟练的新闻干部。在历史上,《新民主报》功不可没!”

“解放之路”寻访报道小组成员、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林溪涛副教授这样评价:《新民主报》是恽逸群“实践党的新闻工作由农村迈向城市一个坚实而有力的开端”。

二、“练兵”丹阳,筹办《解放日报》

对于新解放城市中外报刊的处理,当时中共中央有个指示,即按报纸的进步、中间、反动等性质来分类,采取分别对待的办法。《新民主报》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创办的,经过半年实践,积累了丰富的城市办报经验。华东局为此决定:《新民主报》停办,集体南下,接管上海的报业。为何选择《新民主报》?据“解放之路”寻访报道组采访,这很大程度上跟恽逸群有关:“恽逸群长期在上海等城市做党的地下工作,对当时上海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很熟悉,对要接管的新闻机构也很了解,几乎是‘不二人选’。”此外,《新民主报》绝大多数成员是跟随恽逸群从华中北撤山东的,他们北撤时就心心念念要“打”回老家去。

为接管解放后的南方大城市,华东局早在山东组建了一支3000多干部的接管队伍,随军南下,其中恽逸群任新闻大队长率领的新闻大队有400多人。南下接管队伍随军渡江后,在沪宁铁路线上的丹阳县集中整训,做接管城市的准备。新闻大队在丹阳城北的荆村桥驻扎下来,恽逸群立即组织大家投入紧张的学习,熟悉党的城市工作政策,包括工商业及新闻出版管理等政策。

这时,范长江、魏克明等一批新闻干部也从刚解放的北平赶来了,他们和恽逸群率领的新闻大队会合,开始筹办上海第一家党报。中共中央决定把原在延安创办的《解放日报》名称授予即将出版的上海党报。《解放日报》原是延安中共中央机关报,1941年创

刊,1947年党中央撤出延安后停刊。《解放日报》在上海重新创刊,这对于即将解放的国际大都市上海来说,意义何等重大!范长江、恽逸群等立即组织大家着手创刊前的筹备工作,在田头场地上,在农舍的煤油灯下,紧张而热烈地讨论报社的人事安排、机构设置,出几个版以及各版的内容设计,甚至进行了报纸出版的“实战演习”。编辑们盘腿坐在用稻草铺的地铺上,用新华社电讯稿,一篇篇正儿八经地编起报纸来……第二天破晓,铅字排印的试刊样报出版了!手捧呱呱坠地的样报“新生儿”,大家欢呼雀跃,几天几夜的疲劳和辛苦,随着激动的泪水和汗水一抹而空……

《解放日报》的创刊词又理所当然地落到恽逸群的肩头。恽逸群迅速发挥他“倚马可待”——一天可同时为几张报纸写政论的本领,拿出笔杆,在煤油灯下,不一会儿,数千字的《庆祝大上海的解放》发刊词一挥而就,经陈毅、饶漱石审阅后确定下来。《解放日报》创刊号实际已经在丹阳农村孕育形成了。

三、挺进上海,接管《申报》

在丹阳集中整训一段时间后,新闻大队终于接到向上海前进的指令。5月26日晚,上海电闪雷鸣,大雨滂沱。接新闻大队进城的车辆驶进了徐家汇的交通大道。他们尽管浑身上下被大雨淋透,内心却激动无比。他们在校园里度过了进入上海后难忘而难眠的第一夜——没有床铺,或倚着学校的楼梯边,或躺在学校的课桌上,或干脆睡在地板上……

次日一早,雨过天晴。上海郊外还偶尔传来零星的枪炮声,但刚刚回到人民怀抱的上海初夏,已是阳光明媚,微风送暖,沉浸在祥和欢乐的气氛中。上午10点,新闻大队乘坐的敞篷大卡车从徐家汇开到了汉口路和山东路口,在申报馆门口停下。恽逸群身穿军装,腰佩短枪,蓄着短须,率领新闻大队气宇轩昂地走进申报大厅,向早已迎接在那里的工人群众和地下党员们庄严宣布:“从今天起,申报馆停止出版,由我们接收;民营资本力量才家族投资部分冻结;地下党组织停止活动,一切听从军管会的命令!”接着,他昂然宣布:“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决定,我们明天就要在这里正式出版《解放日报》!”话音甫落,大厅内外群情激昂,人们热烈欢呼,相互拥抱……

翌日,即1949年5月28日,一张代表人民心声的新型报纸,中共中央华东局暨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伴随着解放军和人民战争的胜利,终于在素有“东方巴黎”之称的国际大都市上海出版。4个月后,恽逸群接棒范长江,由《解放日报》副社长、副总编辑转任社长兼总编辑。从此,面向世界的上海报业开启了新的篇章。

资深翻译家张柏然

张柏然,1943年3月26日(农历)出生于江苏省苏州市。抗战胜利后,全家从苏州回到老家武进鸣凰。1949年,进入当地一所小学读书。1961年7月毕业于武进县鸣凰中学。同年9月以优异成绩考入南京大学外文系,专修英文。1966年毕业于留校任教。“文革”期间,张柏然先后在泰州红旗军垦农场、连云港陇东中学、连云港市教育局等单位工作。

张柏然在1978年7月正式调回南京大学外文系,任英语专业老师。1985年,赴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和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1988年8月,受南京大学和商务印书馆委托,负责组建南京大学双语词典研究中心,承担南京大学文科重点科研项目《综合英汉大词典》的主编工作,共3000万字,于1996年年底完成。此后,张柏然便一直致力于双语词典编纂、词典学和翻译学人才培养。1993年10月,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8年1月,受南京大学和商务印书馆委托,正式启动《新时代英汉大词典》的编纂工程,历时6年,于2003年12月完成。

2008年4月,张柏然光荣退休。但他退而不休,笔耕不辍,出版和发表了许多高质量的专著、辞书和论文。2011年,张柏然被中国翻译协会授予“资深翻译家”称号。2017年5月26日,张柏然因病在南

京辞世,享年74岁。2018年9月,张柏然被中国辞书学会授予“辞书事业终身成就奖”。

张柏然的翻译始于1979年,其翻译的短篇小说《职业的选择》(A Choice of Profession)发表在《译林》1979年第一期(创刊号)上;结束于2011年,以译编The Oxford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译文版牛津英汉双解词典》)为标志。张柏然的翻译主要有两类:一是文学翻译,一是辞书翻译。主要译作有:短篇小说《职业的选择》;长篇小说《鲨鱼涛声》(即《大白鲨》)、《超载》《金饭碗》《人生的枷锁》(与人合译)、《愤怒的群山》(与人合译)、《阿钦顿珍珠项链》(与人合译)、《现代派文学在中国》(与人合译)、《人的本性》《血谜》(与人合译)、《绿阴山强盗——约翰·契弗短篇小说集》(译编)、《柯林斯COBUILD高级英汉双解词典》(与人合译)、《译文版牛津英汉双解词典》(与人合译)等等。

张柏然的翻译思想集中体现在他1997年以来先后发表与出版的论文和著作中,如《译学研究叩问录》《译学序言》以及《译林微言:翻译学、词典学序跋暨学术讲座集》等等。张柏然的翻译思想概括地讲,是“古今沟通,中西融通”,“坚持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这一翻译思想为建设与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翻译学指明了方向,明确了路径与方法,真可谓高屋建瓴,辩证而科学。

我在抗洪救灾中担任爆破组组长



抗洪救灾时,作者(左)与爆破组骨干成员在部队驻地。

伤的前提下,炸开东侧堤坝泄洪。为了不受撤离车辆堵路的影响,团里特地从舟桥连调来了冲锋舟,让我们从水路往返作业点和营房区。在爆破爆炸冲击波不会对西侧堤坝造成损

孔至水位深度,然后用导爆索加少量炸药进行扩孔。扩孔结束后,我们再次请示确认爆破时间,得到正式指令后,我带领爆破组成员以及爆破作业炸药和器材,搭乘冲锋舟赶到爆破作业

点,按计算的装药量装填好炸药和起爆装置。我们使用的是电雷管起爆,爆炸点作业完成后,起爆用的电线向部队营房方向引出50米左右。随着我“起爆”的口令,起爆手按下红色按钮,眼见着爆破点泥土飞溅,脚下土地也颤抖了一下,一声闷响随即传来。我最关心的是西侧堤坝有无异样,当确认西侧堤坝没有任何损伤时,我才安心地察看了一下爆破效果,基本符合预期,炸开的豁口开始哗哗流水。第二天早晨,当我们再次来到爆破现场时,豁口已经被洪水冲成30米左右的缺口,河道水位明显下降,白湖农场西区安全度过汛情。据查,白湖农场建成70多年来,共实施过6次炸堤坝分洪。

白湖抗洪救灾任务完成后,我们团又接到支援长江安庆段防洪任务。为确保安庆安全度汛,安徽省抗洪指挥部做好了从望江县行洪区分洪的准备。当我们团来到望江时,行洪区的老百姓都在撤离,我们团的大部队就是帮助群众撤出行洪区,而我们爆破组就吃住在长江堤坝上待命。我们在长江堤坝上住了整整两星期,部队洪水退了,没有实施分洪爆破,结果全部归营。